

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岂之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摘要：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儒学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典籍《礼记·礼运》篇阐述了“小康”与“大同”之世的历史联系，影响深远。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与儒学关系密切，在今天依然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新年祝词中说：“70多亿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应当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他在2016年新年祝词中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2017年1月18日，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说：“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一 联合国 2015 年 9 月 25 日大会决议：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今天宣布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展现了这个新全球议程的规模和雄心。这些目标寻求巩固发展千年发展目标，完成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事业。它们要让所有人享有人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它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

文件强调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从分类上看，一共有五项：

人类：我们决心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与饥饿，让所有人平等和有尊严地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潜能。

地球：我们决心阻止地球的退化，包括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使地球能够满足今世后代的需求。

繁荣：我们决心让所有的人都过上繁荣和充实的生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和技术进步。

和平：我们决心推动创建没有恐惧与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

伙伴关系：我们决心动用必要的手段来执行这一议程，本着加强全球团结的精神，在所有国家、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全体人民参与的情况下，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活力，尤其注重满足最贫困最脆弱群体的需求。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上述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划和阐述。

在上述联合国决议尚未公布前，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五国，计划在这里开创新的历史篇章，用创新合作模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造福于沿线和世界人民。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将进一步惠及有关国家。

二 孔子与儒学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有文明作为支柱，需要研究和弘扬中国古代儒学。

儒学的创始者是春秋末期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约前551—前479）。他是鲁国昌平皐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儒”的名称早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在商代，“丘”相当于“村社”，“丘儒”就是管理一个村社的教职人员，其主要任务是主持祭祀和接待宾客。春秋时期，“儒”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孔子是一位有学问的“儒”，他对诗（举行礼仪时吟唱的歌词）、书（典籍文诂）、礼（仪式规章）、乐（举行礼仪时表演的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车）很熟悉。他整理并删定以前的文献，如《诗》《书》《礼》《乐》，加上《易》和《春秋》，称为“六经”，用来教授他的学生。

孔子依照“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开办私学，把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吸收到门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学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派别，称为儒家八派，其中，子思、孟子学派影响最大。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孔子与学生的谈话整理成书，名《论语》，这是了解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

孔子以前及同时，许多人都讲“仁”。《论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他不赞成把“亲亲”与“爱人”对立起来，认为“亲亲”是“爱人”的起点，但也不要局限于此。《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将这两方面加以结合。孔子说的“仁”是各种德目的总称，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

仁矣”。孔子非常重视孝道，认为人们心里尊敬父母才是真正的孝，如果没有孝心，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战国中期，孟子（约前372—前289）发展了孔子学说。他认为：君子身处富贵温柔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人格；身处强暴威胁之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在他看来，君子有了这样宏大的志愿，就有了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再伴以扎扎实实的行动，这就是实现“君子”价值的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百家之学”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最大、最深的是孔子与孟子提出的价值理论。

总之，儒学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化，讲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与人讲诚信，讲相互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儒学又吸取了佛教、道教中的优秀成分，加以改造，使自身更加充实。

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爱家乡、爱国家、爱人类、爱一草一木，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儒学是重视“民本”的思想文化，主张以民为本，继承西周以来的“明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将道德与政事相结合，提倡“重民”“爱民”“保民”。

儒学充满忧患意识。“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也就是“安而不忘危”或者“居安思危”，提醒人们身处太平顺达的境遇不忘危险祸患，时常警戒，避凶趋吉。

儒学是引导人们追求社会与自然相和谐的文化，并鼓励人们营造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主张用和谐取代社会冲突。

儒学不排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派，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儒学重视人才培养，主张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成才，它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而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

总之，儒学给中华儿女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基因，需要代代守护，又要推陈出新。

三 《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

儒学有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论述。《礼记·礼运》篇托名孔子而把这种社会划分纳入儒学思想体系。这段文字形成的年代，学界多认为在秦汉时期。

《礼记·礼运》篇假借孔子之口，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社会之纲，大同社会是一个贤良在位、讲究诚信和睦的社会，有着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财富为大家共同享有，人人都要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工作。人与人之间充满互助与相爱、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养老送终、教育儿女、抚恤鳏寡孤独都由社会负担，权谋欺诈和盗贼横行消失，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家家安居乐业，人人健康成长，具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称为“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篇认为，随着“大道既隐”，社会由“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期就是这种社会。既然“天下为家”，社会准则按照血缘亲属关系远近确定，劳动是为了自己。治理国家实行世袭制度，人们之间的关爱有限，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按照血缘远近形成社会结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由“礼义”确定相互关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使社会安宁有序。

总之，《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仁人君子”的共同理想。孔子和儒学也有世界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思想和中国儒学有一定的联系。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分别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培根、阿奎那、伏尔泰、康德，将孔子列入世界十大文化名人无疑是合适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从2006年起正式设立，这是首次以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命名的国际奖项，是中国为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全民教育计划和联合国扫盲十年以及千年发展目标，为所有儿童提供学习机会，扫除所有成人文盲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孔子教育奖”备受世人关注，被誉为世界教育界的“诺贝尔奖”。该奖

项主要用于表彰在教育，特别是在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孔子教育奖”的设立，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进“全民教育计划”和“提高能力的扫盲行动”的宗旨，更彰显出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全民教育思想。

四 文化会通精神

儒家《易传·系辞上》有这样一句话：“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在融会贯通中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明显具有这方面的特质。

中国思想文化史可以说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国吕不韦（约前 292—前 235）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既肯定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

汉高祖刘邦（前 256—前 195）之孙刘安（前 179—前 122）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一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教化）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了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

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1139—1193）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思想家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说，思想学说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这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五 如何理解“文明”？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36条是这样表述的：“我们承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容忍、相互尊重，确立全球公民道德和责任共担。我们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认识到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有，“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目标4.7有这样的文字表述：“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这些观点对理解“文明”具有启发性。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文明”的赞美颇不少见。如《尚书·舜典》中的“浚哲文明”，指治国理政者应当具有文明的美德。《周易大传》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等文字，认为具有文明美德的君子能与时俱进，其事业重大而美好。《周

易·贲卦·彖辞》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话，认为文化就是文明产生的良好社会作用。

文明的交流互鉴，并不是去比较谁的文明优越，从而将文明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类别。我们坚信：全球国家与民族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没有高低之分。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1910—2005）有句名言：关于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应当记取的。

六 我们的期望

对我们中国学人来说，需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有了文化自信才能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文化自信首先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坚守。

我的工作是在大学进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我和合作者们看到联合国2015年9月25日的决议，以及其对世界各国对人类优秀文化的关注，感到高兴。近些年来，我和学术合作者研究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其成果于2012年由北京学习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后又加以修订，于201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我和合作者从原始资料出发，加以研究，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之学——天人和谐的探索精神；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进德修业的立人之本；厚德载物——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智慧；仁者爱人——超越自我的大爱精神；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革新精神；天下大同——指向未来的理想之光。为读者阅读方便，几年前我们已将有关资料搜集起来，进行注释，并译成了现代汉语，公开出版发行。

令人振奋的是，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核心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华人文精神”。此文件提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等。依据此文件精神，我们在高校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有了新的“活水源头”。